

4729/27

枣强县文史资料

第一辑

河北省枣强县政协

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

一九八七年九月

前 言

今天，《枣强县文史资料》第一辑与广大读者见面了，这是我县文史资料工作的一个开端。

文史资料的征集、研究和编纂出版，是人民政协的一项重要工作内容，是爱国统一战线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。早在一九五九年四月，敬爱的周总理就提出：“戊戌以来，是中国旧社会变动最大的时期。这个时期的历史资料要从各方面把它记录下来”。他还号召革命老人要“把亲身经历记录下来，传之后代”。搞好文史资料工作，不仅可保存某些重要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真实面貌，更重要的是，可以帮助读者对历史有更多的了解，提高思想认识，树立正确的理想，明确努力方向，从而促进精神文明建设。同时，传之后世，又是一项惠及后人的有益史料。

文史资料工作，就是要高举爱国主义旗帜，本着“存真”、“求实”的原则，团结和动员各界人士，撰写亲历、亲见、亲闻的史料，录之于今，传之后世，使人们从中汲取教益。我们出版这个集子的目的就在这里。现在，出版了第一集，今后还将继续出版第二辑、第三辑，……。有的还将出版专辑。

本辑资料征集、整理和出版过程中，中共枣强县委和枣强县人民政府给予了很大的鼓励和支持，许多同志，特别是一些德高望重的老干部，为本辑以及今后各辑的陆续出版，提供了丰富的资料。对此，谨表衷心的感谢！

由于我们水平所限，而且还在尝试，在文字、编辑等方面，难免有许多缺点甚至错误，我们热情欢迎广大读者及时赐教，以求不断提高我县文史资料工作的水平。还望各界热心文史资料的同志，更多的撰写“三亲”稿件，以丰富今后各辑的内容。

政协枣强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
一九八七年九月

目 录

“大营裘皮”发展今昔·····	李留群··· 1
抢救刘志坚·····	孙连仲··· 15
“七七”事变前的枣强师范、高小及其学潮·····	步丰翥··· 21
景村突围·····	夏书站··· 30
民族英雄“小砍刀” ——张岚峰·····	苏幼民··· 34
枣强的第一条公路——德南路·····	何育红··· 39
枣强县戏曲史话·····	吴国盛··· 42
赵陈县的由来·····	张忠杰··· 54
进步人士吕若增·····	李成章··· 61
武状元——张殿华·····	李章才··· 66
侯豕弧柏及其栽种人·····	潘学良··· 69
董仲舒及其石像·····	吴国盛··· 71
毛鹏及其遗迹·····	孙炎明··· 73
大王均惨案·····	贾桂峰··· 76
日寇在枣强县第一个据点的覆灭·····	王世德··· 80
巾国英雄王新民·····	王世德··· 83
就地除奸·····	张 静··· 86
挖掘抗日交通沟 开展对敌游击战·····	李惠民··· 88
巧端马郎伪据点·····	党史办··· 94
智取娄子炮楼·····	王世德··· 97

大金村战斗回忆	赵明磊	101
七六九团改编“忠义救国军”	孙连仲	104
机智用兵克卷子	党史办	110
奇袭恩察“刘部队”	赵明磊	114
引蛇出洞除庞贼	赵明磊	118
七吉战斗	赵明磊	121

“大营裘皮”发展今昔

李 留 群

(一)

枣强县大营一带的皮毛生产，历史悠久，源远流长，可追溯到商朝，距今已有三千多年。

商末纣王，乃著名暴君，因他“焚炙忠良，剝剔孕妇”，“斫朝涉之胫，剖贤人之心”，“惟妇言是用”（援引武王伐纣檄文）而引起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武王伐纣事件，《尚书》中的《牧誓》、《武成》及《逸周书》中早有记载。据此，宋代《武王伐纣书》明朝许仲琳或陆西星所著《封神演义》中，均用大量笔墨写了九尾金狐吸苏氏之女魂魄，宝剑惊妲己，宰相比干射九尾狐狸、剖比干之心的片断。虽属演义，且神灵鬼怪贯穿始末，但其基本脉络和题材仍不失为真人真事。其中，宰相比干射九尾狐狸后有创其熟制之法，“制裘于广川郡”的文字记载。一九八四年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《可爱的河北》一书中，亦有“据史料记载，商朝比干制裘于广郡，广郡即现在的枣强县”之说。

另据传：比干经常带人在大营一带狩猎，一次偶然机会，发现了老碱地水洼里泡着皮张，于酷暑盛夏而不腐烂，于是从中得到启示，和黄飞虎一道创制了熟皮技法。因之，

象铁匠供老君，木匠供鲁班一样，旧社会皮行的徒弟投师学艺，一直沿袭需先祖拜师爷比干、黄飞虎的行规，枣强亦自古被世人称之为“裘皮之乡”，而大营则被誉作“裘都”。

自商朝比干以来，枣强县大营一带熟皮制裘技术世代相传，不断更新，日臻完美，终得独树一帜，成为闻名于海内外的“营皮”。

(二)

由于大营一带地处我国古道，历来交通便利，为“营皮”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，元末明初，周围诸村落的相继从事裘皮业，使“营皮”小有规模，到清道光二十年（即一八四〇年）前后，“营皮”进入鼎盛时期。

大营一带自古草木虽丰，虽不乏饲养家畜之户，但不具大力发展裘皮之优，野兽虽较之当今为多，却均不能满足日趋增长的皮毛加工之需。鸦片战争前后，国内一些皮货商人云集大营，出售生皮，采买裘皮成品，大营周围各村先后建起了大大小小的皮毛作坊，专营皮货买卖的皮店也应运而生，有些皮匠也出村、出县，甚至进入平津、等大城市招揽生意；或受聘耍手艺，出卖劳力、或设门市开店营业。其后，随着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土地的瓜分、控制，争夺市场，“营皮”的销售范围也由乡村转入城市，由内地延伸到沿海及外国租界地，以至直接运销海外。到清朝末年，“营皮”以其工艺精湛，品质优良而博得国内外用户、客商青睐，大营一带也随之成了华北地区内可与邢台、张家口、辛集齐名的四大皮毛集散地之一。

明朝末年，距大营十公里处的恩察，皮毛手工业也日益兴盛，尤以毡制品（在明朝初期就已畅销山西等地）见长，大集之日，皮毛交易颇旺，虽和大营成呼应之势，各有侧

重，互为弥补，但两皮毛市场的交易品种也显紊乱，出现了皮市有毛，毛市卖国的现象，大营、恩察两地互相争雄，相持不下近百年之久。隸属恩察所辖的王洼村，有一名叫王老汝的，在大营镇开了“聚荣”、“聚圆”两个皮店，出于经济上的直接利益，约于民间初年由他出头并约另外十多家皮店，联名书状，告到县衙经县衙，裁决，凡皮归大营市场，凡毛归恩察市场，这样使这场争持才告平息。自此，大营皮货贸易的核心地位更加突出。而恩察的毛货市场逐渐转移到大营。

“营皮”声名远播后，一些国内和国外的皮货商慕名而至，纷纷在此设立办事处，一九二一年后，英国、俄国、荷兰、美国、葡萄牙、法国、德国等外国巨商及平、津城市的大商号、大货栈进驻大营设庄，常年收购皮货，这时，“营皮”已行销世界十几个国家和地区，随之大营固定皮店增至二十多家，被雇到全国各地采办皮张的达百人之众。

随着皮货成交额的增大，交易场所的不断延伸和人员流动量的剧增，一些为之服务的金融、饮食服务行业也日渐庞大，中国银行、中国农民银行以及河北省银行的分支机构竞相在这里投资，当时大营三城、华丰、仁和皮店流动资金已颇雄厚，银号汇兑范围之广，可达黄河以北，长城以南的诸多大中城市。常驻大营的外国皮货商人一般达五十余人。为满足这些外国商人食宿之需，大营还特设西餐馆一处、澡堂两座，旅店、邮驿、印刷业在其影响之下，也陆续发展起来。

得此皮毛发展盛世，一些资本较多或势力较大的掌柜、股东以及与政界有瓜葛的人物开始发迹，其中大营顾庄村顾孟周，依仗大军阀头子荣臻之势力，靠经营牛皮、黄狼皮大发其

财，以至在北平胡同一条（现在的北京宣武区千买路）大兴土木，营建私寓，并在原籍购地十顷，修深宅，建大院，高泽普（启新皮店）专营黄狼皮，进货可通全国各地，销货能雇用商船，自行组织出口；石村乡老官营村冯丹臣、南宫县侯町村耿文清也于此间靠经营皮货而跻身于首富之列。

“营皮”之所以著称于世，除了历史悠久，水质优良，熟制皮张洁白、柔软，毛色鲜艳等条件外，还大大得益于地皮毛艺人的匠心独运。一九四二年版《民国枣强县志料》的《物产》篇中说，枣强县没有多少可被人称道的东西，“尤为美善皮货一种为枣强特出之品。近十数年来大营区镇颇见繁盛，货店工厂棋布星，论者谓枣强货品惟大营当首屈一指，其采办生皮多由山西、陕西、伊犁、新疆、河南、山东等处；货至则生制为熟，缀之为裘，缝之为褥，转运输出为全国之用。近则采办羊腿，获利又丰。羊腿在昔，为无用之物，而外洋独宝重之，故其货可达海外诸国”。

另据一些老皮毛艺人回忆，除用羊腿皮加工成裘皮，以制作马褂、褥子外，还根据国外需要，另辟蹊径以羔褔（将生未生之羊羔皮）、羊头皮为原料制成皮褥子等。因以羊腿、羔褔、羊头为材料制裘为褥、为服装等乃大营发起，故国内上述绝大部分货源汇集大营市场，国外皮货商也只能来大营采办成品，一时间大营所产羊腿皮褥、服装等成了“别无分店”的俏货。可见，“营皮”声名陡增，与自己独到之处不无关系。

十九世纪末、二十世纪初的几十年间，帝国主义列强加紧了对中国土地的瓜分，划分势力范围，竞相争夺市场，他们一方面销洋货，攫取高额利润，另一方面又搞资本输

出，加剧了大陆矿藏、货源及土特产品的外流。大营裘皮加工范围逐步扩展到周围近百个村庄，大营镇的洋行和外国人有增无减，以羊、狗、猫、兔、黄狼以及贵重的貂、狐狸、灰鼠等为材料的裘皮制品，特别是皮褥子的出口、内销量日益增大。为满足迅速增长的加工量的需要，外采人员遍布西安、乌鲁木齐、兰州、银川、呼和浩特、包头、卓资山、张家口、赤峰、满州里、海拉尔、齐齐哈尔、佳木斯、牡丹江、哈尔滨、长春、吉林、沈阳、锦州、郑州、济南、上海及河北省的辛集、晋县、里县、邢台等地，很快形成了西安、张家口、上海等一些“中转站”，西北数省的皮张统集中到西安，称之为“西安皮”，内蒙、东北数省的皮张集中到张家口，称之为“裘皮”，西南、东南省区的皮张集中到上海，称之为“上海皮”，再由这些“中转站”转运大营，以买卖性加工或委托加工的形式分发到各作坊，加工成件后批量外销。以独到见长的羊腿皮制品靠质轻、毛短，观似“波光粼粼、流水潺潺”，在皮货制品中鹤立鸡群而兴盛达近三十年之久。

中华民国时期，由于经营和加工皮毛制品摊点、人员的剧增，成立了皮毛商会，一任会长是当时大军阀头子荣臻的族侄荣子梅，组织的经费主要来源于购销手续费，规定买卖双方每成交一元，各出二厘三毫，厘属皮店所有，六毫归商会开支，每年商会提取手续费数千元，商会出钱长期雇佣一百多人（一个连）的武装军队，并修筑围墙（小型的城池）。这种组织一方面对保护外商利益和大营一带作坊、皮店的正常生产经营，免遭土匪的骚扰，繁荣大营经济起到了一定作用；另一方面又为帝国主义列强和商业资本家操纵价

格，垄断市场，为地方横征暴敛各种苛捐杂税充当了保护伞，使大多数皮毛艺人负担加重。由此造成了皮毛行业不稳定的局势，加速了两极分化，有的一夜之间可能成为“暴发户”，也有的旦夕之内变成“乞丐”，“抱估”者有之，自杀者也不乏其人，直接影响了皮毛业的发展。所以《民国枣强县志料》有“虽然物盛而衰乃势所必至，近以地方差役与捐纳杂税款曾出不穷，故以极盛区镇亦稍之陵夷矣”之载。

“七七”芦沟桥事变后，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踏进了中国的大半壁河山，大营也难以幸免，一九四一年“鬼子”开始进驻大营。日本帝国主义出于长期占据中国，控制大陆经济命脉的需要，在大营成立了以大战犯仪太郎名字命名的“仪君”商会。由于消费习惯上的差异，细毛裘制品一度遭到冷遇，问津者寥寥，使其一落千丈，粗毛裘制品（如绵羊皮、山羊板子皮等）虽适合日本人的消费习性，但迫于“鬼子”的烧杀抢掠，皮毛艺人整日人心惶惶，置身于虎口之险，疲奔于避难之途，有的妻离子散，背井离乡，焉有心思发展皮毛生产？使当时的皮毛业受到很大冲击。一些较大的皮店被迫迁至平、津等大城市，规模较小的也大都因买卖萧条冷落，入不敷出和“鬼子”的威胁而导致关门。

（三）

在全民抗战的沉重打击下，日本“鬼子”于一九四四年麦收后被迫撤离大营，皮毛业随之得到了复苏，皮毛作坊和皮货店相继开业并有所发展，当时我冀南第六军分区机关的“新华皮货店”，隶属于冀南枣强县供销社的“红星皮货店”拥有工人均超过四十名，为军政机关特别是抗战前线加工皮毛制品作出了一定贡献。到一九四七年，皮毛业又有所

发展,为了加强对皮毛业的领导,由大营镇西小营的行署法院院长李晓寒同志出名,又复成立了皮毛商会,规定凡成交一元收取“二分局”,一九四八年,我各级党、政领导非常关心大营皮毛的发展,对这一传统项目寄予很大希望,采取积极引导的方针,动员广大群众,把零散的资金集中起来,发行了一元、二元、三元的三种股票,广大群众在走合作道路积极性的驱使下,踊跃集资入股,成立了民办合作性质的“华丰皮毛公司”。公司实行统一经营,按股分红,消除了由于多头对外而带来的费用增加的弊端。

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二年期间,正值国家百废待兴,百业待举的恢复时期,国家没有较大财力用于扶持皮毛生产,加之一些皮货资源被残酷战争的无情破坏及一些历史的原因,“营皮”发展虽有一定起色,但仍没实现大的飞跃。

随着合作化运动的不断发展,一九五二年,将“华丰”“新华”、“民利”、“红星”几家皮店合并为“大营皮毛部”,当时有固定职工18人,工房、宿舍48间,两口大锅及缸、铲、刀、剪、案子等少量用具。在工具很不完备的情况下,约70%的生产工具靠工人自备,主要加工绵羊皮、山羊皮、狗皮和以头、腿为材料的褥子。由于当时的对外贸易还是一个薄弱环节,80%的产品用于内销,加之条件简陋,当年产值仅80万元,利润5万元。

到一九五八年,“大营皮毛部”迁址在现在的皮毛厂驻地,改称为“大营皮毛厂”,并转为地方国营单位,职工增至四百余人,一些工具、用具也有一定的增加,产品品种也增添了松鼠、貂、兔皮等,但由于受“大跃进”的影响,加之当时社会上“假、大、空”之风的泛滥,大营皮毛厂也出

现了图“火爆”，求“热闹”，不讲经济核算的问题，当年产值虽增加到100万元，而利润却减少到三万元。

1959—1961三年困难时期，大营皮毛厂也没有多大发展。其后，随着国民经济形势的不断好转，以大营皮毛为根本标志的大营皮毛业也呈跃跃欲试之势，可惜好景不长，到一九六六年，以“文化大革命”为起点，开始了十年浩劫的漫长里程，在大批“唯生产力论”的口号下，谁发展生产，谁就被当作活靶子而受批判，真可谓“风声鹤唳，草木皆兵”没人敢讲经济效益，没人敢提成本核算，于是，长达十年之久，大营皮毛厂面貌没能得到根本改变，一直停留土打土闹、小打小闹的水平上，年产值在百万元，利润在十万元左右徘徊不前。

大营一带广大农民在极左路线的干扰下，不得不走“以粮为纲，全面砍光”的路子，在到处割所谓“资本主义尾巴”的腥风血雨中，搞皮毛生产被视作大逆不道，大部分村社员的皮毛作坊被查封，有的皮毛艺人被当作“搞资本主义的黑典型”而受批挨斗。但是，尝够了受穷苦汁的广大农民，是非常向往富裕生活的，其改变贫穷面貌的积极性也是压抑不住的，他们充分认识到靠单一的农业，农业中单一的种植（只限“两红一白”即高粱、红薯和小麦）是连最低的生活标准——填饱肚子也不能维持的。而发展付业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办法。六十年代末，七十年代初，与林彪、“四人帮”的倒行逆施相抗衡，枣强县大部分村队都相继建起了各种集体付业摊，大营一带搞皮毛加工的尤多，纷纷到大营皮毛厂领取加工任务，农民个人又为村皮毛付业摊缝制裘皮等，“政策”不允许搞，就偷着搞，没大工夫搞，就挤时间

搞，白天不便搞，就充分利用早晚及阴雨天搞。这样一来，不但使“营皮”的涉及范围越来越广，而且为皮毛业造就了一大批能工巧匠、后起之秀。到一九七六年，已有大营附近的七、八个乡的一些村、队搞起了皮毛集体付业摊，为皮毛加工的人员达近万人，初具了专业化协作生产的雏形。大营皮毛厂在粉碎“四人帮”后的第一年（一九七六）完成产值673万元，实现利润56万元，农村为大营皮毛厂代加工收入达140余万元。

尽管如此，“营皮”仍然受着某些条件的制约，而不能得以长足发展，如皮毛业基本上属“官办”性质，不允许千家万户从事生产和进入皮毛流通领域，独家经营，一条渠道调拨加工指标和硬性指令计划束缚了“营皮”发展活力的发挥。

（四）

“营皮”历尽沧桑，几经起落，迎来了千载难逢的盛世。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，作为一个伟大的里程碑，才使“营皮”真正插上了“腾飞”的“翅膀”。

一九七八年以来，在调整国民经济的各项方针政策指引下，大营皮毛厂的一千三百多名干部、职工齐心协力，努力革新技术，改进工艺，加强企业的整顿和管理，根据本厂特点制订了一整套的责任制办法，不断扩大，企业管理日益强化，到一九八〇年，年总产值已达到1201万元，实现利润120万元，发放农村的加工费增加到173万元，出口商品产值占了工业总产值的70%以上，出口品种达一百三十余种。到一九八五年的五年间，虽受货源奇缺、价格暴涨和国际市场皮货滞销等的严重影响，产值仍能保持在700万元，利润70万元左右，产品品种已发展到198

个，畅销世界欧、美、奥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。

古语有云“山不在高，有仙则名，水不在深，有龙则灵”。大营皮毛厂虽一没设在都市，二不近邻县城，但其产品数十载而不衰。他们做到了：

更新传统工艺。原来熟制皮张，是用古老的方法，即以硝面为主要原料进行的，既费工，又费时，效率极低，且熟制出来的皮张板质韧硬，易受潮变型和脱毛。一九八三年，他们大胆推行了铝铬和甲苯常温熟皮法，使工效提高两倍多，节约能源80%，开支成倍下降。

七八年下半年，国际市场黄狗皮畅销，因狗皮资源紧缺，一度供不应求，西德暴布公司捷足先登，研制出了一种叫“山羊仿狗”的新产品，一时销路很好。在其启示下，大营皮毛厂大胆革新，把科学技术运用到染印过程，成功地用山羊皮制出了“仿红狐”，来了个后者居上，这项成果，荣获了国家科技发明三等奖，该产品被评为部级优质产品。一经问世，身价倍增，在一九七九年一月的北京小交会上，西德暴布公司的总经理为之倾倒，赞不绝口，要求一次订购两万件。此后，仿蓝狐、仿貉子、狼皮青、草上霜等三十多个品种，相继试制成功，打入了国际市场。

积极采用先进设备。从一九八〇年以来，他们先后购置了68台缝皮机，还有裘皮服装缝纫机、烫胶机、裁剪机等，其它一些工序的机械也有大幅度增加，基本上实现了半机械化作业，手工操作的局面得以根本改观。

劲敌多加，推陈出新。他们在激励的市场竞争中，根据国内外市场的需求，将粗皮细作，再次加工成裘皮反穿服装、壁毯等。七八年三月，大营皮毛厂派十多名干部、职工

赴北京皮毛二厂、三厂学习服装裁制、制作技术，成立了服装车间。几年时间，生产出了款式新颖，落落大方，档次不同的裘皮服装及装饰品，价值千元的水貂皮短大衣，富丽堂皇，高雅端庄；兔皮挖花制成的孔雀尾短衣，酷似孔雀开屏，争奇斗艳，维妙维肖；经过皮毛艺人加革串刀和精心拼制的裘皮服装，有的缝成人字形，如鸿雁凌空，振翅飞翔；有的缝成曲线形，象微风拂来，碧水初皱；有的制成素凸式，加花式的各种纹络，胜水拥云锦；胜群峰之巅，千仞云气，胜高山瀑布，万里烟霞的奇观。各种裘皮挂毯的图案更是栩栩如生，美不胜收，有雄浑苍劲的“迎客松”，红日映衬，别有洞天；有怒震千山、鸣惊百兽的“下山虎”、“上山虎”。经过精心细作的，与水貂皮大衣配套的各种皮围脖，又是别有风格，其中以兽扫雪皮制作的为上上之品，瑞雪纷飞的天气佩带，可使雪花远而避之，犹入仙境……。

加工与饲养结合，发展稀有资源。一九八二年，他们针对世界蓝狐资源日益减少的情况，得以原籍大营的香港皮革公司董事长、河北省政协委员孙佐民先生的大力资助和联系，从欧洲挪威经飞机转运引进了25只北欧蓝狐，与孙先生合办了国内第一家蓝狐饲养场，现蓝狐不但适应了本地环境，还经过几年的繁衍，饲养量发展到70多只。

伸长触角，面向世界。该厂在充分挖掘内涵潜力，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同时，经孙先生牵线，和香港皮革有限公司，日本霓虹贸易株式会社于一九八四年在深圳特区联合建起了“深圳联合皮毛股份有限公司”，有200名干部、工人前去从事生产经营（该公司一九八五年从皮毛厂中分离，宜属县联社辖）。实践证明，该公司不仅为皮毛厂创造了财

富，更重要的是为大营皮毛厂乃至整个皮毛业掌握国际市场动态，不断更新产品提供了及时、准确的信息反馈，实为一个较理想的经济信息窗口。

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一系列农村政策，合民心、顺民意，广大农民发展商品生产的积极性空前高涨。一九八一年各村相继实行了农业大包干责任制，大营一带农村的一些劳力和农民的剩余劳动时间，理直气壮地纷纷投入到皮毛业，由原来的隐蔽搞，到放开了胆子搞，由原来的只限于集体小干，发展到现在的国家、集体、千家万户一齐上，到一九八五年底，皮毛加工业已辐射到周围的五县（南宫、冀县、清河、威县、故城），本县内的新屯、娄子、金子、张米、石村、恩察、加会、张秀屯、卷子、崔庄等十几个乡的皮毛加工业也初具规模，全县共拥有村办、联户办、个体皮毛作坊及经营单位（户）达一万三千七百多个，涉及到二百多个村的三万余人，县、乡办和供销社办的生产、经营皮毛制品的厂、站（栈）达三十多家，干部、工人达三千多人。仅此一项年产值（销售额）达九千万元以上，标志着“营皮”生产进入前所未有的全盛时期。

一九八二年以来，中央每年都发布一个一号文件，政策一年比一年放宽，使皮毛业彻底打破了独家经营、条块割据、地区封锁的局面，数以万计的农民进入皮毛生产和流通领域，结队搭伙到县里、四川和东北数省等地购买皮张，通过现代化交通工具运至大营，加工制裘。农村以兔皮褥子、帽子、羊皮坎肩、大衣等几种大宗产品为主，大营枣强等皮毛厂则以名、特、优产品领先，初步形成了皮毛业“龙头”带“龙尾”，众星捧月、协调发展、相互促进的格局。